

· 地方党史研究 ·

##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考察(1949—1966)

孟强伟 贾沛韬

〔摘要〕在 1949 年至 1966 年的农村扫盲运动中，福建通过举办冬学和推广“速成识字法”塑造农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凸显严肃的社会主义议题，并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通过“大跃进”及其后的扫盲工作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在此过程中，若干具体措施的实行使得社会主义进入农民日常生活。这一系列革命性实践诠释出社会主义的诸多意涵，促使农民对其形成政治认同，展现了一幅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

〔关键词〕扫盲运动；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民；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2-0142-12

###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ovement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in Rural Fujian (1949-1966)

Meng Qiangwei & Jia Peitao

**Abstract:** During the movement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from 1949 to 1966, Fujian promoted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ew China through winter classes and promotion of a "quick literacy method," highlighting serious socialist issues and creating a structural demand for literacy among farmers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movement. These prompted farmers to embrace communism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ubsequent illiteracy elimination work. During this process, implementation of several specific measures enabled socialism to enter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asants. This serie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interpreted many implications of socialism, promoted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mong farmers, and presented a rich historical picture of shaping the new socialist farmers.

近代以降，许多政治力量都注意到一般民众识字学文化的重要性，这使得扫除文盲逐渐成为各种现代性设计共同着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列宁曾强调，在一个文盲国家里无法建成共产主义<sup>②</sup>。新中国扫盲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大体发生在 1949 年至 1966 年，学界在这方面成果丰赡，考察的重点是农民群体<sup>③</sup>。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扫盲运动有着促使农民实现“文化革命”和“文化翻身”的意义<sup>④</sup>。有学者

① 参见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浙江学刊》2017 年第 5 期。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94 页。

③ 参见〔日〕浅井加叶子著，王国勋、刘岳斌译：《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年；廖其发主编：《当代中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回眸与前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马云：《新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年；李飞龙：《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岳谦厚、杜清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等等。

④ 参见范连生：《革命语境下的文化翻身——评建国初期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1 期；马云、刘建平：《口述视角下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扫盲教育及现代启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 年第 3 期。按：有的研究还扩展到扫盲对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作用和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参见苏泽龙：《20 世纪 50 年代山西农村扫盲与农业生产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Andreas, J. (2004). "Leveling the Little Pagoda: The Impact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nd Their Elimination, on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8 (1), pp.1-47.

通过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民扫盲文本进一步指出，扫盲并非只为了让农民实现“文化翻身”，它更是一个建构政治认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规训过程<sup>①</sup>。尽管现有成果已经对新中国农村扫盲运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例如，回到具体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国家诠释的“社会主义”具有哪些意涵？它们又是如何被农民接受的？本文拟以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 1949 年至 1966 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着力展现运动围绕各个时期中心工作曲折发展、通过若干具体措施深入乡村的过程，以此呈现一段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历史。

## 一、塑造农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1949—1953)

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又以农民的脱盲最为重要，设若扫盲“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sup>②</sup>而解放之际，福建省农村 413 万青壮年中，超过八成是文盲和半文盲，有些山区甚至无一人识字<sup>③</sup>。针对这种情况，福建省政府、省教育（文教）厅多次发布冬学工作指示，各县市按要求组织乡村新政权中的骨干及土改积极分子利用冬闲时间参加学习。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冬学还被转为常年民校（农民业余学校）。1949 年的冬学仅是有重点地举办，1950 年以后办学面逐步扩大。<sup>④</sup>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福建省有计划地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扫盲工作，并陆续举办民校<sup>⑤</sup>。1951 年，福州市的冬学规模较上年扩大不少，做到了村村办冬学、乡乡有民校，还涌现出一批模范教师和学员<sup>⑥</sup>。1952 年，福建省成立识字运动委员会，还组建了以省政府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领导为副主任委员的省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sup>⑦</sup>。受中央政府积极介绍、各地部队广泛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影响<sup>⑧</sup>，1952 年 5 月至 7 月，福州、南安、建瓯等地自发办起 70 多个“速成识字法”实验班。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有的地方教学较为认真，也收到了一些效果。同年 8 月至次年 3 月，福建全省开始自上而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sup>⑨</sup>福建省之所以能在 1952 年出现扫盲学习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推行了此法。

无论常规冬学还是速成方法，学习识字自然是题中之义，而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也是对学习内容的基本要求<sup>⑩</sup>。新政府甫一成立，就把向农民宣传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作为冬学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深入浅出地说明人民国家是如何艰难缔造、人民革命是如何赢得胜利的，为何必须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民国家的新道德，以便使全国人民都能自觉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sup>⑪</sup>。1951 年，教育部又要求在冬学中对农民

① 参见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 年第 4 期；马云：《农民的“文化宝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扫盲教材解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7 期。按：关于塑造“新人”的研究，参见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83、1078 页。

③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15-0104-0062。

④ 1955 年开始，强调常年坚持文化学习，冬季不再另办冬学。参见《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 年，第 432—433 页。

⑤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15-0104-0062；《福建省志·教育志》，第 433 页。

⑥ 《福州市志》第 7 册，方志出版社，1999 年，第 114 页。

⑦ 《福建省志·教育志》，第 804、805 页；《福建省人民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名单》（1952 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07-0057-0107。

⑧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要义在于学好注音字母、多看字形并联系生活实际。参见华东工农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93—94 页。

⑨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 年 10 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08-0083-0184。

⑩ 参见《福建省志·教育志》，第 432 页。

⑪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 开展今年冬学工作 解释共同纲领树立国民新道德》，《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7 日。

进行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sup>①</sup>。这些在福建省文教厅所编的《冬学课本》中均有反映，“毛主席，救人民，领导工农大翻身”“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等以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话语，在刚刚解放不久的福建农村，显得十分新颖<sup>②</sup>。在推行“速成识字法”的过程中，各类识字课本也都着力塑造政治认同。例如借用老农的口吻说，旧社会“不讲理，富人享福，穷人受气”，新社会“好汉懒汉分高低”，“活一年，好一年，日子越过越香甜”<sup>③</sup>。直到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这种强调新旧对比的故事仍然在识字课本中大量存在。有的课文朴实地描述了农民从过去“面黄黄”到现在“脸胖胖”的变化，然后简单明了地指出，这是因为农民听了党的话<sup>④</sup>。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扫盲运动除了具有基本的文化教育功能以外，要旨在于尽快塑造农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乃是党和国家确定的阶级柱石之一。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农民实际指的是贫下中农。尽管富农阶层同样存在很多文盲，但福建省选出的脱盲典型仍然都是贫下中农出身<sup>⑤</sup>。即便原本应该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脱盲标准（认识多少个字算作脱盲），当时也会按照阶级身份区分出等级。1953年的脱盲标准分为“干部和工人”“农民”“城市劳动人民”等三个类别，其中工人应识2000个常用字，农民1000字。在1956年的脱盲标准中，工人识字量不变，农民调升为1500字。相比之下，1988年的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则以职业身份和居住地域来界定识字主体，具体包括“农民”“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sup>⑥</sup>改革开放后扫盲工作面向全体人民的取向，更加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阶级分层意识。

和多数群众运动一样，福建省在推行“速成识字法”时因为急于求成而造成了不少问题。特别是1952年夏季以后，出现了“轻率冒进”乃至“轰了起来”的状况，看重速成而轻视民校的偏向十分明显<sup>⑦</sup>。有的地方甚至将“速成识字法”神秘化，宣传三个月就能认2000字，却未讲清这需要350个小时的课堂突击<sup>⑧</sup>。发现问题后，福建省三次缩减任务，将脱盲的计划数字从62万人减至18万多人，但这又被认为是犯了“急躁冒退”的错误。再加上与春耕生产结合得不好以及经费上的紊乱等问题，扫盲工作呈现混乱局面。南安县在第一批整顿中将四个乡的学员从1438人减少为879人，被剔除的学员对此颇为不满，表示“起火也是你们，打火也是你们”；长泰县学员说，“教师没有良心，把我们一脚踢开”；宁洋县甚至有学员“撕掉书本”并“痛骂一顿”。<sup>⑨</sup>1953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扫盲中的轻率冒进现象，认为不适当地强调扫盲工作的重要性而把“摊子铺得太大”是不切实际的做法<sup>⑩</sup>。在中央舆论指导下，福建省决定纠正扫盲运动中“轻率冒进”和“急躁冒退”两种偏向，重点在于前者，明确否定了竞赛、创模等“轰轰烈烈的做法”，着力进行整顿巩固<sup>⑪</sup>。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1979年印行，第23页。

② 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编：《冬学课本》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4、5、12、16—19、34—36页。按：这一时期福建的工人夜校同样在努力启发“翻身感”、灌输“剥削”等马列主义基本概念。参见《福建省志·教育志》，第440页。

③ 《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上册，第8、9页。

④ 参见福建省教育厅编：《农民识字课本》第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2—33页。

⑤ 参见《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6年），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722-2。

⑥ 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76页；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713页。

⑦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年10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184。

⑧ 《惠安县五三年扫盲工作总结》（1953年12月28日），惠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0114-001-0017-0062。

⑨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年10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184。

⑩ 《扫除文盲的工作必须整顿》，《人民日报》1953年4月9日。

⑪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年10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184。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尚未进入社会主义，但冬学和速成识字扫盲中的国家认同教育事实上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第一步。尽管“速成识字法”因推广时急于求成而逐渐被放弃，但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中才真正开始“运动”起来，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因为它始终配合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而进行，中心工作起起伏伏，农村扫盲运动便随之“波浪式”地向前发展<sup>①</sup>。

## 二、社会主义议题的凸显与农民的识字需求(1953—1957)

国家要求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觉地投入其中。即使是在后来成为福建第一个无盲乡的古田县秀峰乡，也有人说：“自古以来有人担策（指竹子——引者注）借谷，没人担策借字。”老人怕女儿和儿媳读民校会“变坏”，还有的人认为自己笨、学不会。<sup>②</sup>之所以出现此类声音，是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权力关系，使农民感受到国家的权威，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因而农民仍然如传统乡土社会之时一样，没有识字的需求<sup>③</sup>。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这种秩序才被彻底改变。自此，发展集体生产与做好分配成为农民的基本任务和利益所在。为了保障自己在农业合作社中的利益并维持其运作发展，他们较为普遍地“自动”产生了识字的需求。

站在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这一问题，会更加清晰明了。因为不独中共，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和国民政府也曾在扫盲的同时着力推进合作化，却都没能将二者结构性地联系起来。

1926年，在关于“平民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晏阳初将贫困视作平民识字教育的难关之一。如其所言，中国人民“十九赤贫……自无闲情逸致，抛开谋生而受教育”。<sup>④</sup>因此，他试图把识字与改善生计结合起来：通过培训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来给他们提供低息贷款，同时要求只有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才能加入信用合作社，以此激励文盲参加平民学校<sup>⑤</sup>。晏阳初推行合作化的初衷在于通过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纾解识字教育中的“穷难”困境。但他反过来又要求农民只有识字才能参加合作社，以致识字与合作化互为前提，陷入循环的怪圈。不难看出，这种通过外部强制把合作化与识字机械地结合起来的办法，使得晏阳初的合作化没有也不可能生产出农民内在的识字需求。在此情形下，他通过改变农村文盲遍地的状况来培养爱国者进而实现国家强大的愿望必然落空<sup>⑥</sup>。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主导的合作化，在相当程度上承接了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实践遗产<sup>⑦</sup>，因而与晏阳初的合作化相似，国民政府也把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事业的主流来发展<sup>⑧</sup>。可是，注重给农民提供贷款的做法表面上使得农村合作运动的“国家化”程度大为加深，却没有改变民间“自治”的格局<sup>⑨</sup>。诚如时人所批评的，这种没有身份与资产界限的合作制度理想在农村遭遇的现实是：多数合作组织都被豪绅把持，而一般的合作社社员，除地主富农外大

① 参见《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62。

②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1958年5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3-0088-0067。

③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2页；徐秀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④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⑤ 参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7、268页。

⑥ 参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119—120页。

⑦ 参见陈意新：《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⑧ 参见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

⑨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16—17页；刘纪荣：《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

多数是中农，最需要银行贷款的贫苦农民反而被排除在合作社大门之外，他们需要农本时，仍然只能求助于高利贷者<sup>①</sup>。概言之，虽然国民政府加大了资金层面的介入力度，但仍属民间“自治”的合作化注定很难与农民识字问题结构性地联系起来。1935年之后，为配合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只能诉诸早见端倪的强迫识字措施，福建省还专门颁布了强迫识字的办法<sup>②</sup>。此时所用的识字读本则旨在普及基本道德规范和一般常识，强化对于诸如本省、“党国”及其领导人和合作社等的认知与感情<sup>③</sup>。此外，当局更将识字人数的多寡与“国家民族之盛衰”联系起来<sup>④</sup>，在未能创造出农民内在的识字需求的情况下，此等流于空泛、无所着落的说教预示着强迫识字只能草草收场。

反观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合作化运动是在国家强力主导下，将分散的小农全部组织到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之内。实践中，开始时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和随后的整顿总体上还算稳步前进、健康发展，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全国形成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浪潮。这使“社会主义”成为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议题。福建省闽侯县荆溪区在大约20天的时间里就将初级社及部分单干农民组织进高级社，据说“全区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仙游县仙水乡仙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仅用18天时间就完成了向高级社的转变，有的农民认为步子走得太快：“我才入社就取消土地报酬，你们走的几步路要我一步就走完……”有的农民则抱着“随大流”的想法：“有土地报酬也好，没有土地报酬也好，我家有两个劳力反正差不多。”<sup>⑤</sup>无论抱怨还是从众，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已经发生彻底改变。既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就要发展集体生产并做好分配。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口头交流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于是，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识字需求被发明了出来。

概言之，与晏阳初和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化相比，中共主导的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引发的“结构化选择”<sup>⑥</sup>，在凸显社会主义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此种需求虽然源于国家这一外部性动力，却因为农民难有选择而成为他们的内在需要。毛泽东认为，组织农业合作社之后，农民因为经济上的需要会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因而扫盲问题必须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可谓至言<sup>⑦</sup>。这也回应了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社会文字难以下乡问题的思考。费孝通曾明言，除非“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sup>⑧</sup>。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造成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

关于合作化之后农民迫切需要识字的情形，福建省尤溪县的故事极具代表性：

新桥区洋头乡午后村，14户人家，过去没有一个识字人，参加合作社后不会记工账，只好在账簿上画圈画道道。社员的姓名写不来，就从村头到村尾按居住的次序排队。第一页为第一户，第二页为第二户，其余顺序推下去。大家想想，这有多大困难。<sup>⑨</sup>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古田县秀峰乡。由于村民不重视，合作化以前，该乡的扫盲工作不尽顺遂。原本早在1952年春季，乡里就办了冬学班，但随着春耕生产的到来而很快解散。之后每年也都办冬学，却总是“冬季来了办冬学，春节、春耕来临就垮台”。然而，不识字根本无法应对合作

① 参见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462页；《薛暮桥文集》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70、271页。

② 参见《福建省志·教育志》，第434页。

③ 参见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编：《福建民众识字读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④ 参见福建省普及识字委员会编印：《福建省识字教育概况》，环球印书馆，1936年，第1页。

⑤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福建农业合作化运动》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12、25、29、28页。

⑥ 参见吴毅、吴帆：《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⑦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⑧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23页；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68—91页。

⑨ 《扫除文盲宣传提纲（一）》（1957年11月22日），尤溪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0-6-5。

化以后的新形势。1954年，乡里办起初级社，只找到几个粗通文墨的人来记账，其中两人还有政治问题。余下村民连肥料价格也不会算，无奈之下只好叫来地主帮忙，还要派人在旁监督。社员自己不识字、不会记工分，让别人记又怕记错，以至于“晚上睡不着觉”。有的社员常常为一两个工分闹到半夜，争执不休。<sup>①</sup>

对于本身也是农民的农村干部来说，有文化则是维持农业合作社运作发展的必备素质。因为合作社是集体生产，要求干部制定生产计划，进行计划管理，处理日常事务，还要他们通过参加会议、看文件和报纸、发通知等形式来掌握和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没有文化绝难胜任。福安县溪邳乡的一个文盲党支部书记到县里开会时无法记下上级布置的任务，看文件、发通知、写条据都要靠别人帮忙，难以履行职务<sup>②</sup>。在尤溪县，甚至出现这样的状况：

汤川区纪纲乡爱护社，有一次要向汤川借粮，会计写了一张介绍挑粮的条子，放在办公室里，请社长郑裴镇盖公章和私章。因为社长不识字，错把放在旁边的一张信盖上章交给社员去挑粮，结果粮食挑不来，空花了五个工。<sup>③</sup>

由此可见，合作化使得识字脱盲成为农村干部群众接轨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国家不仅发明了农民的识字需求，还通过组织扫盲运动充分保障了这种需求的实现。1955年底，中共福建省委要求配合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切实将扫盲工作纳入全面规划<sup>④</sup>。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4月，中共福建省委要求迅速建立各级扫盲协会和办公室。同月底，以副省长陈绍宽为会长的省扫盲协会即告成立。<sup>⑤</sup>这一年，福建继1952年之后再次出现扫盲学习高潮，全省共有120万青年参加民校学习，共扫除16万青年文盲<sup>⑥</sup>。

农业合作化推动扫盲真正“运动”起来，但1956年春夏的反冒进扩展到扫盲领域之后，福建有些扫盲干部和民师（农民业余教师）开始出现思想顾虑。他们抱怨说：“最倒霉的就是搞扫盲工作，三天风，二天浪，没有一天平静”，“宁可降两级去当小教（指小学教师——引者注），再也不干扫盲了”。一些基层干部也担心再犯冒进的错误，以至于有的县委指示今后一概不发民校灯油费，有的区委布置不要搞扫盲工作，还有的区委书记批评扫盲干部和民师是在“搞资本主义”。<sup>⑦</sup>这些言行不免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初衷在于纠正经济建设盲目发展的反冒进同样抑制了农村扫盲运动的盲目铺开。这种影响在1957年全面体现出来，是年，福建省扫除的青年文盲数量较少<sup>⑧</sup>。

### 三、在革命口号中促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1957—1966)

1957年底，中央层面开始在经济工作中“反反冒进”，“大跃进”运动渐次发动起来并席卷全国。在此过程中，“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和“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成为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基调<sup>⑨</sup>。为了强调政治挂帅，各级党委书记都亲自抓扫盲工作。在干部群众中间，针对错误

①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1958年4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5-0003-0019。

②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6年），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722-2。

③ 《扫除文盲宣传提纲（一）》（1957年11月22日），尤溪县档案馆藏，档案号60-6-5。

④ 《中共福建省委转发省教育厅党组、团省委“关于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农民扫盲工作的方案”》（1955年12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0200-0119。

⑤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中共福建省委大事记（1949—1956）》，1999年印行，第239页。

⑥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1959年10月31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0458-0017。

⑦ 《关于本省扫盲工作情况简报》（1956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1-0077-0046。

⑧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1959年10月31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0458-0017。按：就全国范围来看，1957年的脱盲人数也比上年略有减少。参见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31页。

⑨ 《关于1960—1967年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草稿）》（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32。



观点进行了思想教育。<sup>①</sup>最为常见的教育方式是“辩论”。例如，龙溪县孚美乡针对不少干部和民师中存在的“生产忙，不可能组织班级学习”“分散学习，零零星星，不成样子”等错误观点、保守思想展开了辩论<sup>②</sup>。所谓“辩论”，事实上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动不动‘辩你一家伙’”<sup>③</sup>，实际上已容不得落后分子。有的地区还敲锣打鼓地给那些再三动员而不入学的青年贴大字报，据说这个办法很灵验，很多顽固的人都被“攻入学”了<sup>④</sup>。此种情形非福建独有，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大跃进”开始后，福建提出不少脱离实际的扫盲任务和办学目标，例如在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彻底扫盲，成为无文盲省<sup>⑤</sup>；要组织一半的农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入学，并扫除其中的20%<sup>⑥</sup>。在“大跃进”的氛围下，扫盲“喜讯”频传，数字亮眼。在省委“苦战30天，实现普及教育”的号召之下，据说莆田县五天就办起120所农业初中，七天就普及了中小学，已做到每个乡都有农业中学，每个合作社都有小学，每个生产队都有幼儿园；海澄县苦干一天就创办了53所农业中学；南安县居然一昼夜之间就普及了教育<sup>⑦</sup>。据统计，全省入学人数从1950年的43万余人发展到1958年的近300万人。1959年，省委发动“大战”八九月，要求大搞扫盲运动。当时的材料显示，在这两个月里，全省有220多万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民校学习。到年底，全省已有246万多青壮年农民摆脱了文盲状态，非文盲率已达78.2%；有55个县市的青壮年非文盲率超过80%，其中20个县市达到90%；八成左右的脱盲群众升入业余高小班继续学习。截至1960年1月，全省农民入学人数超过305万人，其中近78万是文盲入学，进入业余高小和业余中学的则分别有218万多和9万多。<sup>⑧</sup>省里进而要求当年就完成扫盲和普及业余初等教育的任务<sup>⑨</sup>，群众中甚至出现了“扫盲不稀奇，高小也还低，中学算一般，目标是大专”的诗句<sup>⑩</sup>。

“大跃进”期间，高指标、浮夸风并非农村扫盲运动所独有，但这项工作似乎又有其独特价值，当时的一个革命口号精练地体现了这种价值——“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由于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目标，某种意义上讲，这时的农村扫盲运动已经“口号化”了，似乎在夸张的革命口号声中，社会主义新农民已经诞生，毛泽东所期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图景已经浮现。<sup>⑪</sup>

然而实际上，“大跃进”期间，福建民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加之其他条件限制，前面描绘的扫盲成效恐怕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小落差。当时就有人质疑1958年的扫盲成绩，他们说：“扫盲有

①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62。

②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1958年5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3-0088-0067。

③ 《毛泽东传》（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60页。

④ 《关于本省大跃进以来青年扫盲情况简报》（1958年5月23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0389-0001。

⑤ 《学习秀峰 认真扫盲》，《福建日报》1958年3月26日。

⑥ 《转发教育厅党组关于春节前后开展扫盲宣传的意见》（1958年2月4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2-0021-0004。按：当时不少地方甚至有更为夸张的计划。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河南省提出要在一年内“消灭文盲”，毛泽东对此虽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因此并未制止，而是主张让其一试。到了11月，毛泽东直言“不太相信”半年、一年就能扫光文盲的说法，认为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期间扫除了就不错。参见《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60—1761页；《毛泽东传》（五），第1870页。

⑦ 《普及教育、扫盲、勤工俭学情况简报》（1958年4月12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2-0018-0106。

⑧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62。

⑨ 《关于传达贯彻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情况的简报》（1960年2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050-0046。

⑩ 《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在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1960年1月23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01。

⑪ 1949年至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近2800万人，而1958年一年即号称扫盲4000余万人，远超前九年的总和。随后两年公布的扫盲人数大幅减少，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大。196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时说，到1959年，已有1.1亿多青壮年摆脱了文盲状态，占农村青壮年总人数的2/3。参见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下），第1831页；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

成绩，天晓得”；“去年扫盲 80%，今年复盲 80%”<sup>①</sup>。另据当年接受过公立小学教育的一位永春县东平镇村民回忆，大炼钢铁期间，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则要到溪边洗黑砂以备炼钢之用<sup>②</sup>。全日制学校尚且如此，民校扫盲的效果不难想象。惠安县净峰镇的一位扫盲积极分子回忆说，“大跃进”时期白天忙于生产，晚饭后去夜校学习，虽然积极性很高，但是“学了就忘”，以至于自己到现在还是不识字<sup>③</sup>。积极分子尚且如此，一般学员的情形同样不难想象。此外，直到 1964 年 4 月，教育部还在答复福建省有关职工和农民中非文盲达到什么比例才算基本扫盲的问题<sup>④</sup>。这从侧面说明福建农村此时仍未实现基本扫盲的目标。同年夏，福建省教育厅在闽侯县开展通过拼音识字扫盲的试点工作，动员入学时即有群众直言，1958 年的扫盲“没搞成”<sup>⑤</sup>。理论上讲，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或许是脱盲不够扎实而“回生”乃至“复盲”。不过，“大跃进”时期看似丰硕的扫盲成果本身存在虚报浮夸因素，无疑也是事实<sup>⑥</sup>。

尽管“大跃进”时期的数据存在水分，但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以福州市某农业合作社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八年里，1/3 青壮年文盲社员成功脱盲。其中，有的人当上了生产队长、技术员、会计和民师；有的人过去一字不识，如今却能担任出纳；有的人从民校毕业后到福建机器厂学习农业机械技术，能够组装、修理抽水机和碾米机等机器；有的民校女学员脱盲后学习开拖拉机，成为女拖拉机手。这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质量和生产能力。<sup>⑦</sup>截至 1960 年 1 月，通过扫盲和其他业余学习，福建省 36 个县共培养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 11 万多人，技术员 6 万多人，会计和记工员近 3 万人，民师 7 万多人<sup>⑧</sup>。这些人能够在农业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中胜任各自的职务，客观上展现了农村扫盲运动的效果。

1961 年，福建各地开始要求“适当安排”扫盲工作，强调坚持群众自愿、不影响生产和劳逸结合的原则，做到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sup>⑨</sup>。自此以后，农村扫盲工作虽仍间或以运动的面目出现，但作为一场严格意义上的运动其实已经停止，转而进入常态化阶段。不过，“大跃进”时期农村扫盲运动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的做法却被承袭了下来。“四清”运动中，革命口号持续高扬，为适应“突出政治”等口号，1965 年以后，在开展民校教育时，国家开始将毛泽东著作定为政治学习的核心内容。1966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在扫盲过程中学一些毛泽东的语录。<sup>⑩</sup>7 月，教育部进一步提出，职工和农民扫盲应以《毛主席语录》为基本教材<sup>⑪</sup>。对此，福建省不甘落后，迅速与曾在江苏省邗江县方巷大队蹲点的张爱萍联系，请求印刷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编的《学毛主席著作识千字》。该书从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农民的角度出发，力图兼顾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识字两个需求。获得同意后，福建省即在民校

① 《密切配合当前生产高潮、掀起农民学习高潮——董纯才副部长总结发言》（1959 年 11 月 4 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15-0104-0020。

② 笔者采访福建省永春县东平镇村民的记录（2022 年 7 月 15 日）。

③ 笔者采访福建省惠安县净峰镇村民的记录（2022 年 7 月 13 日）。

④ 《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第 128 页。

⑤ 《拼音识字扫盲试点工作报告》（1965 年 7 月 10 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24-0496-0120。按：到 1965 年 9 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蹲点的江苏省邗江县方巷大队仍有 95% 的人是文盲。参见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 382、387 页。

⑥ 在广东省，根据比较实际的统计，到 1958 年底共扫除文盲 260 万人，但由于层层虚报，最终形成的扫盲数据是 547 万人，比实际数字多出一倍还多。这使得“复盲”现象十分严重，一般都有 30%，部分单位甚至达到 40% 至 60%。参见何辛编著：《广东教育 50 年（1949—199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65—66 页。

⑦ 《福州市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7 年 12 月），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G722-1。

⑧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15-0104-0062。

⑨ 《批转专署教育局关于 1961 年下半年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意见的报告》（1961 年 7 月 29 日），闽侯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0029-002-0471-0024。

⑩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1382、1401 页。

⑪ 《农民扫盲记工教学课本》（1966 年 7 月 14 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78-024-0527-0006。



扫盲班中将其作为教材使用。<sup>①</sup> 不难发现，扫盲进行到此时，已经因为中心工作的变化而承载起新的政治话语，非常时期到来之前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宏大历史进程也进入尾声。

#### 四、农村扫盲运动的具体措施：社会主义进入农民日常

在农村扫盲运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既要有切合受教育对象特点的动员技术，又要根据“业余教育”的现实条件作出细致周到的安排，在此基础上，再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通过农村扫盲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措施，社会主义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渗入乡村日常生活，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愈发深入。

##### （一）文化诉苦

即使是合作化以后，出于多种原因，许多有了识字需求的农民仍不愿主动投入扫盲运动之中。想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就要配以相应的动员技术，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情感动员”，即诉苦。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教育中，已有泛泛的、新旧对比式的诉苦。而在扫盲真正“运动”起来后，更具针对性的“文化诉苦”则更为突出。与土改中的政治诉苦相似，文化诉苦也强化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结，深化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sup>②</sup>。

文化诉苦立基于对解放前农民无法读书识字的控诉。如福建省制定的《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所言，彼时，文化教育因被地主和资本家控制而只为少数人服务，即使某些城市办有民众学校，也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sup>③</sup>。浦城县一位民师说，农民兄弟“不识字增加了不少痛苦”，他自己就是如此，12岁开始给富农放牛、当长工，很羡慕富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于是带着做长工攒的钱去五里之外的地方读夜书。直到解放后村里开办民校，他才有机会正式上学，后来还成了省级扫盲优秀教师。另一位扫盲积极分子诉苦道，自己从八岁起给地主放牛、当长工，曾经因为翻地主儿子的书而挨打，此后再也没有看书的机会，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sup>④</sup> 对比之下，旧社会之苦与新社会之甜跃然纸上。

应该说，“解放前农民受教育权利被剥夺”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土改的建构性话语<sup>⑤</sup>，但是通过此类诉苦，农民对于以新农民之姿投入扫盲的认知还是会有所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也就随之被激发了出来。同时，农民被强化了与国家之间的联结，其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会显著加深。

##### （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

在实现有效动员的同时，还需要组织稳定的教师队伍，这是农村扫盲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硬件基础。1953年以前，尚有一些专职教师参加扫盲工作，但因经费入不敷出<sup>⑥</sup>，只能转而动员民间力量，采取“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办法，发动符合条件的本地人在自愿和不耽误生产的原则下担负起农村扫盲教学任务<sup>⑦</sup>。在民校里，只有少数编内专职教师，师资主体是“就地取材”的民师。下放干部、回乡职工和学生，以及文化程度较高、政治条件较好的在乡知识分子都可以担任民师<sup>⑧</sup>。例如1956年，秀峰乡的扫盲运动达到高潮，教师人数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① 《初小学生和业余扫盲采用学毛主席著作的课本》（1966年6月25日—7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24-0549-0017。

② 参见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78页；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等。

③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1957年11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2-0067-0141。

④ 参见《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6年），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722-2。

⑤ 参见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

⑥ 《批复有关扫盲工作的几个问题》（1953年4月27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023。

⑦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年10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184。

⑧ 《关于1961年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意见》（1961年2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6-0087-0104。

的高小毕业生、复员军人等进入民校参与扫盲<sup>①</sup>。

对于实质上仍是农民、业余充当教师的民师群体，需要经常性地开展思想工作。仍以秀峰乡为例，有些民师认为“当民校教师没前途，不如当干部”，乡党支部就强调“教人识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sup>②</sup>。省里也针对“当民师没出息”“增加额外负担”等观点，强调当民师是每个农村文化人的光荣责任，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行动<sup>③</sup>。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引导应该可以发挥提高觉悟的作用，或者说构成某种潜在压力。至于具体效果，则需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针对民师的思想工作不只包括价值观引导，还有现实优待。秀峰乡将民师当作干部看待，请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关心他们的政治要求，对满足条件的还会积极吸收入党入团<sup>④</sup>。这显然有助于促使民师走出不安于位的消极状态，奋力投入扫盲运动之中。

在实际教学中，“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意味着水平有限的民师常常处于一种边教边学的状态。福建全省虽然建立了组织化的教师进修网和教学辅导网，但整体而言民师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根据光泽县的统计，1960年，在600多名民校高小班教师中，文化程度为“扫盲毕业”的占65%，高小程度占30%，初中程度只有5%。<sup>⑤</sup>对于占比超过一半的仅有扫盲毕业文化程度的民师来说，教群众识字或许还可以应对，教高小班则难免力有不逮。如此便不难理解秀峰乡为何会出现学员讽刺民师“床底下踢毽子——平平高”（意思是教师和学员的水平差不多）的现象<sup>⑥</sup>。应该指出的是，“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是符合实际的合理选择。广大民师在回报很少的情况下兢兢业业投入扫盲工作，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低估；即便有缺点和不足，主要也源于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不应过于苛责。

### （三）“政府领导，农民自办”

在实现有效动员和保证师资来源之后，就要把农民组织到学校中来。福建农村扫盲运动是在缜密的组织领导之下开展的，总结出了“党委挂帅、全党动员、层层负责、单位包干”的经验<sup>⑦</sup>。该经验要求基层党委做到“五统一”（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统一布置、统一检查、统一评比），干部做到“三包”（包生产、包组织入学、包巩固毕业）和“五定”（定人、定班、定时、定任务、定质量）<sup>⑧</sup>。这些部署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至于经费，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多数时候由群众本着自愿原则自行解决。早在1953年，福建省教育厅即指出，作为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扫盲不能由政府“包下来”<sup>⑨</sup>。1956年，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的指示》中，福建省委、省人委明确提出，扫盲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必须大力动员群众和社会力量来协助政府开展这一运动。《指示》还指出，民校经费或是靠学员自筹，或是通过组织学员搞副业和开荒等办法来解决<sup>⑩</sup>，合作社公益金只能作少量补助。<sup>⑪</sup>永定

①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1958年4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5-0003-0019。

②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1958年4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5-0003-0019。

③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1957年11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2-0067-0141。

④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1958年4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03-005-0003-0019。

⑤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62。

⑥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1958年5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3-0088-0067。

⑦ 《关于在农村中继续认真扫除文盲、大力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意见的报告》（1959年5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4-0042-0001。

⑧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1960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5-0104-0062。

⑨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1953年10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184。

⑩ 具体来说，就是采取“近山靠山、近水靠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办法解决民校经费和民师误工补贴等问题。就连扫盲毕业证书，都要由群众自费解决。参见《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1957年11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2-0067-0141；《有关扫盲标准等问题》（1953年9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08-0083-0015。

⑪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的指示》（1956年6月），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8-011-0082-0004。

县古镇乡的一些民校学员因交不起灯油费而想退学，乡里组织他们搞副业生产、为供销社挑运货物，所得收入充当灯油费。有的班仅靠运货一项一个月就挣得16元。<sup>①</sup>费用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师资也主要来源于农民，这使得农村扫盲运动看似颇有群众“自主办学”的味道。但很显然，这场运动的主导力量、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和政府。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政府领导，农民自办”的措施主要落实在“铁民校”上。所谓“铁民校”，指的是能够做到学员常年学习、比较稳定巩固的“四季常青”的民校。在虑及农民生产忙闲等现实因素的前提下，其具体要求大体是：能够坚持学习一年以上，每年至少学习250个小时，经常学习的学员巩固率达到80%以上，等等。<sup>②</sup>秀峰乡（秀峰生产大队）的民校是“铁民校”中的典型，《人民教育》1960年第1期刊发福建省教育厅的文章，介绍秀峰大队“铁民校”普及业余初中的经验。同年3月14日，《人民日报》不但报道了秀峰扫盲的先进事迹，热情赞之曰“文化革命红花插秀峰”，还称“铁民校”已在福建各地农村遍地开花<sup>③</sup>。同月，教育部党组在报告中提出，可以在全国推广福建“铁民校”的经验<sup>④</sup>。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由此成为国家样板。

#### （四）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

扫盲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联系实际”服务社会主义<sup>⑤</sup>，所谓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具体的国家任务。例如在永定县古镇乡，民校上语文课时尽可能结合具体任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抗旱时，就讲“人定胜天”和“刘胡兰”两课，以英雄模范事迹鼓舞学员投入抗旱斗争。征购余粮时，就教唱相关歌曲，并在黑板上写上“大家踊跃出售余粮，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口号，让学员抄写。又如在莆田县联星乡，1955年征集补充兵员时，由于民校学员带动，全乡93%的青年报名应征。这年冬天，在民校妇女学员带动下，全乡350名妇女投入抗旱工作，共挖掘大型水井312个。此外，乡党支部在春耕中号召每个学员三天内积肥20担，结果平均每人完成27担。<sup>⑥</sup>凡此种种或许可以说明，福建农村扫盲运动在贯彻落实各项国家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民在承接以上四项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宏大高远的社会主义意象，而是进入日常的社会主义。农村扫盲运动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由此润物无声地走向具体深入。

### 五、结 语

从全国范围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扫盲运动成绩斐然，帮助大量农民实现了“文化翻身”。但这场运动并非只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更有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之意图。通过考察1949年至1966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可以发现，由于这场运动始终跟随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实行了文化诉苦等具体措施，其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体现为一系列革命性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举办冬学还是推广“速成识字法”，都将农民识字与塑造其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结合起来。合作化运动在凸显社会主义这一严肃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扫盲由此真正“运动”起来，识字脱盲成为农民接轨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大跃进”及其后的常态化扫盲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而文化诉苦的动员技术、通过“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来保证师资、建立政府领导下农民自办的“铁民校”，以及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则

①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6年），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722-2。按：此种情况并非福建一省特有，很多地区都是如此。参见《热心扫盲的民校教师》，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24页。

②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1959年10月31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0458-0017。

③ 参见《文化革命红花插秀峰——访福建古田县大桥人民公社秀峰生产大队》，《人民日报》1960年3月14日；《福建“铁民校”遍地开花》，《人民日报》1960年3月14日。

④ 参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967页。

⑤ 参见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

⑥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1956年），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7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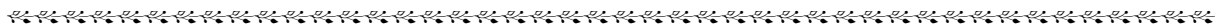


是农村扫盲运动实行的具体措施，社会主义由此进入农民日常。这些革命性实践为农民诠释出认同新中国、识字脱盲、革命口号和日常措施等“社会主义”的诸多意涵，促使他们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农村扫盲运动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由此得以展开。

最后，似有必要对农村扫盲运动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内涵作进一步讨论。前已述及，新农民不仅包括完成扫盲的普通农民，还包括脱盲后成为基层干部的农民。国家的人才需要构成了调整政治分层的动力，而扫盲运动则使部分农民进入更高的政治层级，实现了向上的政治性流动。这是围绕干部队伍的科层结构来重组社会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国家整合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普通农民的“文化翻身”还是部分脱盲农民成为基层干部，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身份都对其有相应的限定：对于脱盲的普通农民来说，“文化翻身”不等于通向无限制的个体自由；对于经过扫盲成为基层干部的农民来说，干部身份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农村而真正向上流动。因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普通农民读书识字为的是更好地担负起他们作为“国家的农民”的责任，而基层干部学文化则是为更好地做好“国家的农村工作”。由此可见，虽然晏阳初和国民政府的扫盲实践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主导的农村扫盲运动都担负着“为国”的重任，但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完成这一任务。

(本文作者 孟强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贾沛韬，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 鹏)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要目

- |                                    |  |
|------------------------------------|--|
| 捍卫“两个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曲爱国）             | （林 盼）                                  |
| 新时代十年中国全面加强社会建设的探索创新<br>（吴 超）      | 1949—1957年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问题及其应对<br>（訾夏威）     |
| 上海私营体育场馆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br>（张 屹 申 亮 于明星） |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格局、趋势与<br>原则方向（张树华 李 旭） |
| 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兴起<br>及其影响（梁 腾） | “卫生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的<br>形成过程（李彦昌）     |
| 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br>（陈 刚）         | 通信技术与国家治理：1956—1960年农村电话网<br>建设考察（邓 理） |
| 资源集聚与城市再造<br>——156项工程建设时期上海与洛阳的共振  | 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规范利用的历史考察<br>（蔡少燕）           |